

顾问：叶文虎

NATIONAL STRATEGY OF NEW CENTUR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跨世纪战略：可持续发展

吴树青题

周毅 著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跨世纪国略：可持续发展

周毅 著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皖)新登字 02 号

责任编辑:席广辉

跨世纪国略:可持续发展

周毅 著

*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 1 号新闻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230063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6.5 字数:678 千字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6 000

ISBN 7-5337-1607-8/Z·176 定价:45.00 元

(本书如有倒装、缺页等问题向本社发行科调换)

目 录

一、发展观的转变:从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	(1)	1. 互动与共存	(82)
1. 历史的观点	(1)	2. 人类惨重的代价:地球生物圈的 失衡	(82)
2. 传统发展理论的局限性	(3)	3. 人口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85)
3. 三种发展模式	(5)	4. 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93)
4. 世界现代化运动:发展理论的实践	(9)	四、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16)
5. “经济长波”:发展理论新思路	(10)	1. 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17)
6. 传统发展战略的演变:向现代化 运动的挑战	(13)	2. “换体”革命潜伏着流产	(118)
7. 无理性的片面经济增长带来了 系列“世纪性难题”	(17)	3. 从筹划、探索、递进到推进、 突破、布局	(135)
8. 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人类开始 重新审视发展历程	(18)	4. 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战略:经济 增长方式转变	(142)
9. 可持续发展理论逐步得到国际 社会的高度认同	(20)	5. 社会和谐呼唤市场新秩序	(150)
10. 可持续发展:从概念到理论再到 战略	(23)	6. 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154)
二、从理论探索到战略实施:中国可 持续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32)	7. 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无序	(156)
1.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国经济社会 的必然选择	(32)	8. 改革、稳定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164)
2. 中国头号难题:人口可持续发展	(37)	9. 转型期社会意识反常,社会问题 交织	(174)
3. 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	(53)	10. 面向未来的挑战:经济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178)
4. 中国人口流动的历史及现状 ...	(59)	五、再次飞跃论:农业可持续发展	(182)
5. “民工潮”功过说	(73)	1. 转型农业论:战后四大战略	(182)
三、青山、绿水和蓝天的呼唤	(82)	2. 世界可持续农业发展	(184)
		3. 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取向	(186)
		4. 产业化:中国农业可持续运行	

定位	(190)		(246)
5. 规模经营:从沿海到内地循序 渐进	(195)	8. 在积极缩小东西差距中反贫困	(251)
6. 生物工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技术路线	(202)	9. 在可持续发展区域经中反贫困	(256)
7. 农业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208)	10. 在正确处理效率、公平与发展 的关系中反贫困	(264)
8. 粮食保障与农村可持续发展	(219)	11. 从以埃经验看中国治荒治贫	(268)
六、从“南巡”向“西进”:可持续 发展反贫困战略	(225)	12. 科教扶贫,文化兴农;智力 支边,变铁为金	(272)
1. 民意倾向:从锦上添花到雪中 送炭	(225)	七、精神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	(291)
2. 了解贫困才能了解国情	(227)	1. 可持续发展两翼:市场文明互 动论	(298)
3. 世界超级难题:西方贫困化与 各国政府行动	(230)	2. 理性市场基本精神:社会主义 人道	(335)
4. 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	(232)	3. 市场文明与可持续发展:德力 并重	(350)
5. 西学中用:从梯度反贫困向点轴 开发	(237)	4. 可持续发展的资源通道:市场 人际互动论	(369)
6. 政府反贫大行动:本世纪末消除 绝对贫困	(239)	主要参考文献	(404)
7. 在加快缩小城乡差距中反贫困			

一、发展观的转变：从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

发展是文明社会的永恒主题，是现代人类的自觉意识。自从发展成为人类一种自觉的生存选择，便产生了关于发展的理论。它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揭示和发展目标的总体设计。发展理论虽出自少数社会精英之手，却与整个人类利益息息相关。随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发生质的变革，发展理论愈益受到各种性质、各种类型社会的重视，并成为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舆论先导和精神力量。诚然，关于人类发展的兴趣并非新兴，对可持续问题的探索也非始于当今。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姗姗来迟的回归“人类发展学”意味着恢复传统，修复前辈留下的遗产，而不是标新立异或改弦易辙。发展理论经历了一系列转变，从实质上可以将其归纳为两方面：一是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到以社会全面发展为宗旨的转变；二是从以发展的“客体”为中心到以发展的“主体”为中心的转变。如果说前者是“发展范围”的扩大，那么后者则是发展目标和核心的转变^[1]。

1. 历史的观点

在发展理论的研究中，“发展”概念是一个核心概念和构筑发展学的基石。人们对发展概念的理解以及在整个发展观上，都经历了一个认识的演化过程。

在当代任何国家和地区，“发展”都是一个令人怦然心动的字眼。它构成我们这个星球“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之一。人类社会亟需从传统的发展观转变为新的发展观。人们曾赋予“发展”许多含义。有的学者认为，在科学发展史上，“发展”一词曾有过以下三种含义：第一，是由黑格尔阐明的、关于纯粹思维规定的辩证演进，即把社会发展看作是与一系列逻辑概念辩证进展相一致的“发展”，即“逻辑的与历史的一致”之说。第二，通常所说的“事业发展”等概念，在实际意义上是社会学中“变迁”的意思，与“发展”的第一种意思不同。第三，在“发展中国家”的说法中，“发展”一词的含义是走向现代化社会。发展是人类共同的和普遍的权利，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享有平等的、不容剥夺的发展权利，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权尤为重要。经济学家们是在以下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即“发展”的实质是指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如何实现现代化问题。也就是说，“发展”是研究、探讨、总结和寻求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在通往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它包括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发展途径、发展方法、发展的优先领域，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等等。从广义上讲，发展是全球性共同课题，只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内容上的阶段性差异和发展模式上的不同选择而已。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主要是回答工业化实现以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新变化和今后工业化社会、信息化社会发展的问題；对于不发达国家（即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务之急仍是如何实现工业化和全面现代化问题。从狭义上讲，发展问题又是一个针对性很强的问题。它更主要的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如何由落后的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过渡和转化，其研究对象包括经济、科技、政治、社会、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目前，发展中国家正经受着来自贫穷和生态恶化的双重压力，贫穷是导致生态恶化的根源，生态恶化又加剧了贫穷。贫穷和生态恶化像是一对难舍难分的双胞胎，把发展中国家拖进了一个十分艰难的境地。正因为如此，发展理论把消除“贫穷”当作实现发展战略的一项不可缺少的条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第一位的，只有发展才能为解

决贫富悬殊、人口猛增和生态环境危机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资金，逐步实现现代化，最终摆脱贫穷、愚昧和肮脏。此外，发展不仅是解决贫穷的钥匙，也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人口、文盲、生态危机和不卫生等一系列问题的必要手段。在现代，“发展”的概念又被赋予更新的含义，这就是“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在文明生活中的意义，将会随时光流逝而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因而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正逐步升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

发展的概念来自于胚胎学，代表着一种自然的生命演变过程。如果还要追溯到更早，那么，人类发展概念产生于人类历史初始，可以在灿烂的古代文明中找到源头。亚里士多德曾揭示发展的主旨：“财富并不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善，因为它只是有用的、为其他目的服务的东西。”类似的思想火花交相辉映在计量经济学早期创建者的作品中。一般来说，经济学家笔下的发展通常是经济增长，社会学家则用社会变迁来说明社会发展，其他学科也都有自己的发展范畴。

(1) 早期发展的中心议题是人类生活质量

世界中世纪的智慧大师像威廉·配第、格列高利·金、佛良西斯·昆斯奈、安东尼·拉瓦塞尔、约瑟夫·拉格朗日等并不是拜金主义者。在近现代，青胜于蓝，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如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罗伯特·马尔萨斯、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和伟大导师卡尔·马克思更不是唯财富论者。当亚当·斯密这位自由经济和私有化鼓吹者认为经济发展应该使每个人自由地与他人相处而“不感到窘迫”时，他所表达出的是一种超出计算食物摄入量之外的贫困概念，即把穷人融入社会主流的主张。难能可贵的是，发展概念在早期演变过程中，把收入和经济增长当作手段，直接关注的焦点是人自身，包括人的个体性和群体性、共同性和差异性。发展的中心议题是人的生活质量，不仅是经济指标，而且包括人类力所能及掌握其生活各领域的多种选择。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历来不是唯一选择。只是到了20世纪，社会科学才逐渐转向经济问题：注重的是财富，而不是人；偏重经济，而不是社会；收益最大化，而不是平衡。虽然沉迷于物质主义倾向为时不长，但现代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们的盈余贸易平衡问题，主张“增加国民财富”的成见，却至少可以追溯到忽视人类生活质量，单纯追求物质成就的重商主义。当代主流派经济学传统，仍然只关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财富之类的变量，是以财富为中心的传统经济学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异化。它把人视为生产工具，而忽视人权和人道乃至人性的普遍性，因而成为名副其实“沉闷的科学”^[3]。

(2) 财富与人类发展

为什么财富最大化与人类发展之间会出现矛盾？对于人类发展财富固然至关重要，然而排他性地对财富一味执迷不悟则是极端错误的。其一，积聚财富并非实现人类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事实上，个人和社会所作的许多选择并非以财富为准则。一个社会未必非常富裕才能支持民主，一个家庭不一定人人都珠光宝气才能尊重家人的权利，一个国家也并不见得必须兴旺发达才能实现男女平等。往往无价的社会和传统文化，能够在不同收入水平情况下得到发扬光大。文化的丰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独立于并非人人梦寐以求的财富之外。其二，人类的视野要远远超出狭隘的经济利益沼泽地。人类向往财富，但更渴望长寿和健康，畅饮知识的甘泉，沐浴精神的阳光，呼吸新鲜的空气，拥有清洁的自然环境，享受简朴充实的生活乐趣，保持安居乐业和社会安全的心境宁静。国民财富有扩大人类选择的可能性，但也往往适得其反。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家怎样运用财富，而非财富本身。真正的财富乃是人民。过分

沉湎于物欲横流，只会使人类迷失自我，看不清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财富最大化和人类发展之间的这种矛盾与其说是学术难题，倒不如说在实际操作中存在更大难度。尽管在物质财富和人类发展之间存在明确的相关关系，但在相当多的社会中，两者未必同步。相当多证据表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和人类发展指数在统计学上的相关现象，是通过提高 GNP 在社会公共事业方面投入比重以及减少贫困方面的努力而发挥作用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不在于财富最大化过程，而在于个人和社会所做的选择，这是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简单道理。归根到底，核心问题乃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偏重财富的积聚。

（3）人权的普遍性

可持续发展模式注重的是人类生命自身价值。发展必须有助于所有人最充分地增长其才干，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能，用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各个领域。生存权利主张的普遍性，乃是一条共同的纽带，它把今天的人类发展与昨天谋求发展的迫切需要，特别是面向未来的环境保护和再造需要连在一起。环境保护最有力的论据是一种道义需要，即确保人类后代享有与他们的先辈相似的发展机会，这一保证乃是“可持续人类发展”的基础。人类发展和可持续性是一生存权利主张的普遍性和道德性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在同一总体设想和同一概念框架之中，普遍性和道德性明确要求做到当代人之间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机会均等，构成寻求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基础。这个世界需要的是公正而不是慈善。可持续人类发展意味着我们负有一种道义，至少应像前辈那样，为后代人着想和行动。所有延期债务都将以牺牲可持续发展为代价——不管是经济债务、社会债务还是生态债务，莫不如此。这些债务都是向未来举债。

2. 传统发展理论的局限性

从发展观的演变看，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发展的最新认识成果。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经济中心型”发展观，它把发展视为单纯的经济增长，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文明的唯一标准，带来的是“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严重社会问题；70 年代是“社会中心型”发展观，它既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强调把社会文明纳入发展内容中，是人类发展观的巨大进步；80 年代以来，出现了“可持续发展”，它是针对世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问题提出来的，要求经济增长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协调发展。从可持续发展内容看，它是人类发展观质的飞跃。在经济上，它评价经济发展的标准是产品质量，而不是产量，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过渡到集约型；在政治上，它扩大民众参与范围，同时经济稳定发展；在社会上，它尊重人的需要，消除贫困、失业，减少社会不平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等。从可持续发展的特征来看，它是宏观整体性、战略性的高层次发展。在时间上，它是世界代代延续不绝的发展，不是短期行为的发展；在空间上，它不以局部利益牺牲社会整体利益，不以区域利益牺牲全球利益。从发展方式上看，它是各要素系统的协调并进，不是片面的单打一式的发展；从发展类型上看，它是内涵型、质量型的发展，是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人类生活质量，保护和改善生存环境，不单纯是外延型、数量型的扩张。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是高层次社会文明观^[4]。

（1）发展理论的广义和狭义

以发展或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发展理论研究全球范围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研究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广义的发展理论产生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法国的启蒙运动首先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社会发展问题，人类发展自我意识得到启蒙，社会发展开始走上人类“自为的寻求发展”道路。19

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学者孔德创立了一门旨在阐明现存社会制度基础和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科学，即社会学。他将社会学划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前者研究社会秩序，后者研究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从此以后，社会秩序和社会变迁成了社会学研究的两大永恒主题。19 世纪中叶，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作了全面研究，创造性地研究了社会发展的动因、阶段、手段和形式。马克思发展理论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哲学层次的发展理论，具体体现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中，探讨世界发展中的所有发展问题及其规律；二是社会发展理论，集中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理论，科学社会主义是它的集中体现。这三部分构成一个完整的发展理论体系。进入 20 世纪以后，列宁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同世界发展趋势以及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发展理论，对 20 世纪的发展产生了最深远、最广泛的影响。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学者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提出了诸如进化论、结构功能主义、冲突论等社会变迁理论。

狭义的发展理论是研究“非西方欠发达国家”或者说“发展中国家”从欠发达、欠发展状态向发达状态过渡的条件、动力、方法和途径的理论。这是严格意义上或固有意义上的发展理论。通常所讲的就是这种狭义的发展理论。

（2）传统发展观不能回答“二战”后新问题

本世纪以来，工业化浪潮打破了传统经济下田园式宁静，人类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速度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和文明进步。然而，伴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的“普照之光”，人类又面临着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其中最显著的是人口剧增、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浪费。这些不仅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还危及到人类的生存。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历程，寻求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传统发展观念中，人们视发展为单纯的经济增长，把经济看作是利用自然资源尽可能多地生产所必需的物质产品的活动。应该说，18 世纪西方开始的工业革命拉开了这一发展的序幕。伴随机器大工业的迅速发展，西方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物质财富迅猛增长。“工业文明”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刺激人们不顾后果地追求物质财富。传统经济学的发展观基本上是一种“工业文明观”和“工业实现观”。在这里，工业增长是衡量发展的唯一尺度。“经济增长”是传统经济学的关键词语，是支撑传统经济学思想的三大基础（与“充分就业”、“自由贸易”并列）之一。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一发展观表现为对国民生产总值 GNP 高速增长的热切追求，按照这种发展逻辑，工业化国家以日益膨胀的水平维持其消费生活方式，而非工业化国家则需以美国为模式实现其工业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达国家抓住战后有利时机，致力发展经济，普遍经历了 20 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展中国家不甘落后，千方百计谋求经济发展，在亚洲出现了“四小龙”腾飞的奇迹。同时，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凯歌声中诞生了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这些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以后，要在经济上真正获得独立与解放，就必须解决如何发展的问题。这不仅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面临的迫切问题，而且也是全世界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50 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一批学者首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和南北关系中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一门跨学科的、新兴的学说，即发展理论。发展理论自 50 年代产生以来，形成了前后相继的三大理论，即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发展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无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都试图解释为什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实现了

现代化，而许多非西方不发达国家至今仍处于落后的不发达状态，都试图解决和回答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如何发展、如何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问题。它们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但是，这些理论存在着严重缺陷。第三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也证明，发展理论无法满足其发展需要，并没有真正回答和解决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如何发展，如何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问题，更没有也不可能回答和解决中国这样原来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前苏联和东欧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对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作过一些有益的探索，但也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5]。

3. 三种发展模式

如前所述，“发展研究”是“二战”后，为解决新独立国家的发展模式以及它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问题而兴起的理论研究活动。随着这一研究活动的展开，分化出许多具体学科，如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哲学、发展政治学等。这里的“发展”概念指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概念比“社会变迁”概念要狭窄。任何社会质的、量的改变，都可以称为“变迁”，只不过有性质与程度的区分而已。“发展”则不然，“发展”与“进化”、“增长”相联系。“变迁”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负向的，而“发展”则一定是正向的，负向的变迁不能算发展。发展社会学家胡格韦尔特认为，狭义地理解发展，则发展与“进化”是同义词。“发展”一词把变迁和增长连在一起，还意味着二者之间有逻辑联系。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是在如此理解“发展”基础上进行的。发展模式的界定与发展的双重含义相关。发展既指人类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的变迁，又指向某种既定目标有意识的行动。因此，从时间向量上说，发展概念既可以是对历史变迁的描述，又可以是对未来历史前景的设计和预测。从后一个意义上说，发展乃是人类有目的的行为。正如胡格韦尔特指出的：“……社会生产能力的扩大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成了一切发展模式的目标。因此作为行动发展主要是主张促进经济发展。各国领导人、决策人、基层代理人以及外国顾问同时也都认识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包括经济的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也都需要改变。因而，‘作为行动的发展’又意味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人为工程学。”从“发展”的双重含义出发，“发展模式”既可以是对人类社会历史进化所遵循方式的抽象和概括，又可以是对人类社会从现实状态向未来状态进化所应遵循方式的设计和规划蓝图。换言之，发展模式是指人类社会从一种较低级状态向较高级状态转化时所遵循的方式，即它所遵循的原则、途径、程序及终极结果。

具体特征如下：

第一，它是历史性与未来性的统一。它既可以是历史的描述，又可以是对未来的理想蓝图，而且作为发展模式，它是将历史的经验应用于未来的理想，在创造社会的未来时，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

第二，它是可变性与相对稳定性的统一。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是一种近似的概括，是对主要社会历史因素的抽象。因此，它只能近似地描述过去或未来。真实的历史、起初的未来，不可能完全不差地与模式相一致。归属于同一模式的不同的真实的历史主体（国家、民族、地区等），其发展的真实历史进程必然与模式有差异，它们彼此也有差异。但是，对属于同一发展模式的历史主体来说，其发展模式又是相对稳定的、一致的，不是无定形的东西，不是随意变动的，其基本要素、程序、原则是稳定的，基本一致的。

第三，它是渐进性与飞跃性的统一。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不只是历史上的渐进行为，它常常包含着质的飞跃。它描述历史上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渐进性与飞跃性的统一，其中充满矛盾、冲突、曲折。它不是静止的东西，而是在历史运动中保持一种相对稳定性。

第四，它是具体性与整体性的统一。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是由许多具体的因素、过程、方面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它既包含丰富的具体的因素、过程、方面，又是由这些具体东西有规则地构成的一个整体模式。它是具体性与整体性的统一，具体的成分离不开整体，整体也离不开具体成分。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主要出现过三种模式：原发式、后发式、新发式。

原发式。原发式主要指以英国、美国、法国为代表的最先实现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之所以称之为“原发式”，是因为它们是最初的现代化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样板可资借鉴，整个社会发展都凭社会自然演进，人们并不知道历史发展未来的结局。这种“原发”模式具有一系列特征。第一，发展动力来自社会内部，由社会自身需要引起的社会内在矛盾，推动社会发展。以英国为例，生产领域珍妮纺纱机的出现是由于飞梭的发明导致棉纱供不应求，而飞梭的发明是由于人们对高质量纺织物不断扩大的需求。蒸汽机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各种新机器对动力的需要。教育上的双轨制，是为了满足社会工业化过程中对少量尖端科技人才和大量有一定文化可以掌握机器生产的劳动力需要。政治上的三权分立原则，是为了防止再出现克伦威尔独裁现象。一些思想理论界的新观念，也是为了满足新的社会现实和政治存在的需要。

第二，从发展特征看，这种模式是漫长社会自然成长过程，整个社会发展表现出缓慢、渐进、稳步、和谐的特征。西方研究现代化的学者布莱克指出：“在率先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中，由于现代性的挑战主要来自内部，因而转变过程徐徐展开，延续了几个世纪。”他把现代化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现代化领导的强固、经济和政治的转变、社会整合。他以英国为例，认为传统领导嬗变为现代化领导发生在1649年～1832年，经济和政治转变是在1832年～1945年，直到20世纪国家的政治体制才完全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变革，社会整合则是“二战”后几十年的事情。这种模式的最大优点和特点，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具有渐进的自发性、稳定性和协调性。任何一个社会领域的演化都经过了一段足够漫长的持续阶段。例如，城市发展速度比较缓慢，不像现代新发式国家中城市的急剧膨胀。伦敦人口从100万增加到800万用了130年时间，而墨西哥的新墨西哥城只用了30年（1940年～1970年）。

第三，从发展程序看，原发式大体经历了思想启蒙、政治变革、经济飞跃等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出现，引起生产领域的变革，新的市民阶级的产生。适应代表新生产力的市民阶级需要，出现了最初的思想启蒙运动，即为整个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作准备的文艺复兴运动。新生的市民阶级要想发财致富，就得向自然索取，必须认识自然的本来面目，探索自然固有的规律。而这一切都要靠人去实现。但在当时，经过中世纪1000年的黑暗，人成为上帝的造物和奴仆。不打倒上帝的权威，不扫荡神学的樊篱，人就不能解放，科学就不能振兴，生产就不能发展。于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自然科学、自然哲学和人文主义思潮便应运而生，成为向封建、宗教势力猛烈冲击的时代大潮。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变革，为西方文化确立了科学、民主、人文主义的特征。17世纪～19世纪上半期，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和适应夺取政权的政治需要，资产阶级掀起了更广泛更深入的理性启蒙运动。理性成为裁判一切的最高法官，人权成为人性的本质要求，人成为目的本身，上帝不仅被无神论者证明为子虚乌有，并且被揭示为人的造物。自由、平等、博爱成为理性人道主义的战斗口号。理性、人权、自由、平等成为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文化的主要特征。夺取了政权的资产阶级，日益暴露出新剥削阶级的真实面目。由于思想启蒙的彻底性，

促使西欧国家的社会文明、物质文明得以稳步、健康、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宗教改革确立的新教理论，同世俗的人文主义思潮一样，渗透着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精神。因此，韦伯才竭力证明新教理论对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作用。

新型社会结构的各种因素，在旧社会结构中产生并逐渐趋于成熟，构成潜在形式的新型社会结构。成为显形的新型社会结构一般都经过政治上的巨大变革。1640年~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使资产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87年的宪法，提供了民主宪政制度基本原则。马克思在评价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指出：“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要求。登上政治舞台成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新社会政治制度和新社会结构，使得在旧社会结构中形成的潜在新型结构成为现实东西。经过几百年发展和完善，形成了现在西方社会制度。正如马克思·韦伯指出的：“由定期选举的议员组成的议会，以及由民众领袖和政党领袖充任部长的政府，更是我们特有的，……事实上，国家本身，如果指的是一个拥有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制订的法律，并且有一个受理性的规章法律所约束、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这样一种政治联合体而言，那么具备所有这些基本性质的国家就只是在西方才有，尽管用所有其他方式也可以组成国家。”

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西方社会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是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还要多，还要大。”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最终完成。19世纪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进程。工厂代替了手工作坊，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技术，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例如，从1850年至1870年，20年间世界总产值增加了1倍，以后的20年间又增长了1.2倍。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以电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动力革命，使发电机、电动机、输电设备、电灯、电报、电话、无线电通讯等一系列电气设备得到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9世纪最后30年间世界工业总产值增加了两倍多，其中钢铁产量猛增55倍，石油产量增加25倍。20世纪随着物理学革命开始的原子能的成功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空间技术、生物技术的出现和实际应用，形成了以电子化、自动化为特征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新的科技革命使整个世界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生产力获得空前大发展，物质生活发生质的飞跃，得到有史以来最高程度的完善。原发式国家凭借高度发展的科技水平，获得强大的综合国力，使其国民生活达到很高水平。

后发式。后发式指以日本为代表的后现代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原发式国家作样板，人们对社会发展的未来结局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对现代化过程中将出现的问题，有原发式国家经验教训可资借鉴。第一，从发展动力看，其动力根源在于社会外部。由于外在环境的逼迫和挑战，使社会领导层有意识、有目的地推动社会向原发式国家学习，向现代化目标前进。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调控整个社会的国家政治权力。例如，日本现代化的两个重要阶段即明治维新时期和盟军占领时期，改革都是由外在动力推动的。明治维新之前，近代日本面临的形势与中国相似：在外强武力威胁面前，国家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正是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的情势下，日本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运动。它成为日本由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转折点。权力至高无上的天皇成为改

革的直接推动者。1868年3月以明治天皇名义发布的“五条誓文”和“政体书”，标志着明治维新的开始。政治上，提出“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取消社会等级制，废藩置县，模仿三权分立；经济上，振兴工商业，允许自由择业，土地自由买卖，鼓励贸易，统一汇兑，统一币制，取消关卡，建立统一大市场；文化上，普及教育，广开学堂，学习西方科技和文化。明治维新初期改革，使日本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经过30多年对外掠夺和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日本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日本真正实现现代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盟军司令部指定的五项改革措施（即：给妇女选举权，给劳工组织工会的权利，实行自由教育，废除专制政府，经济民主化），以及农村中彻底的土地改革，使日本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根据五项改革的指示，修改宪法，结束专制政治，废除贵族爵位，贵族院改为参议院，废除枢密院，颁布新宪法。依据新宪法，天皇不过是一个象征，人民具有主权和基本人权，地方实行自治，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日本现代化与原发式国家内源式动力不同，乃是在外力推动下的改革过程。

第二，从发展特征看，后发式国家由于有原发式国家作榜样，可以实行跨越战略，所以现代化发展表现出快速、突进的特征。正如布莱克指出的：“在后现代化社会中，这种挑战越来自于外部。因而转变来得更迅速、更突然。”日本在实行政治改革以后，从1955年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到70年代中期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这期间，学习原发式国家的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55年~1970年间，日本以60亿美元的支出，换回了全世界近半个世纪以来几乎全部先进技术，使日本在15年内赶上了科技最发达的美国，节约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和十分之九的研究资金，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

第三，从发展程序看，后发式国家首先是以国家政权力量，来改革局部社会政治结构，推动经济发展。发展经济成为国家关注的核心问题。经济发展到起飞阶段后，才比较彻底地完成整个社会的政治结构改革，从而促进经济更大程度的发展。在整个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社会处于一种急剧变迁的状态，社会存在的转变是剧烈的、突进的，所以在精神文明领域便造成传统观念与新观念并存和相互冲突的现象。传统观念中的消极东西相对滞留，不肯自动退出舞台；传统观念中的积极东西，也来不及寻找新的社会存在的载体，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新的社会存在要求的新观念，常常由原发式社会传播，一时难于在变动的社会存在中扎起根来，而随着社会转型由原发式社会传进来的消极精神垃圾，则乘机泛滥。由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主要是依照原发式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改造传统社会，所以，它在文明的三个领域都明显地带着原发式资本主义现代化特征。日本整个社会巨变，是在外力人为推动下短期内实现的，而非社会自发地长期协调演进的结果。它在物质文明领域已经成为第二经济大国，但在社会结构文明领域，表现出相对滞后、欠稳定、欠协调的特点。尤其在精神文明领域，还保留着许多传统的非现代化东西。即使一些新观念，例如竞争，日本人的理解也与西方不同。西方强调个人竞争，日本强调团队竞争。日本政界高层人物接连不断的贪污受贿案，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武士道精神难以消除，家庭生活中的大男子主义盛行等，就是与三种文明不协调的明证。

新发式。新发式指目前正在向现代化目标前进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模式。由于既有原发式国家的现代化做样子，又有后发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所以新发式国家向现代化过渡的措施是多种多样的。新发式模式就时间而言也是后发的，它也具有“后发”优势。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它的发展又有一些不同于“后发式”特征。首先，表现在

发展道路、现代化措施的选择上,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后发式国家,例如日本,在选择现代化道路、避免沦为殖民地时,只有一条道路可走——采用原发式国家的道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当时,问题就是如此尖锐,或者是整个民族沦为资本主义奴隶,或者自己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日本选择了后者。由于20世纪近百年来变化,新型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和蓬勃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众多国家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资本主义殖民体系,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一两个或几个资本主义强国主宰世界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为第三世界国家自由地选择现代化道路,奠定了政治基础。其次,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一体化进程加快,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相互联系进一步加深,已经不可能有哪个国家——无论其力量有多强大——可以割断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而能保证自己民族的正常生存。这种经济格局为每一个国家从实际国情出发,发挥自己的优势,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遇和条件,选择自己的道路,提供了可能性。最后,由于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范围的国家独立、民族平等的原则得到空前的普及和认同,以强凌弱,以大压小的传统国际政治原则越来越行不通。不同民族文化上的交流和相互尊重,愈来愈成为国家、民族之间交往的公认准则,为第三世界国家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国情出发,建设既符合本民族文化传统,又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社会,提供了宽松的国际环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国情,采取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例如,巴西曾经采取大量引进外资、发展出口加工工业的路子,从1960年到198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3倍,年均增长率为10%。但后来因债台高筑,对国际市场依赖太强而陷入困境。近年来,智利经济发展很快,他们采取市场经济模式,使智利经济在70年代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80年代末达到10%,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2000美元;1990年~1996年增长速度为6.3%,199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500美元。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但至今还未形成一种公认的有效成型模式。可以说,“新发式”是正在形成中的发展模式,民族性和多样性是它的基本特征。更为典型的新发式首推亚洲“四小龙”。30多年来,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省和香港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由贫穷落后变成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经济学家们预测,21世纪初,“四小龙”将后来居上,步入发达经济行列。“四小龙”新发模式已引起全世界震惊和注目^[6]。

4. 世界现代化运动:发展理论的实践

首先,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活动实践性的产物,它相对于远古和中世纪文明。现代化是一种崭新的活生生的文明形态,它不是一种幻想或所谓的理论假设,而是对近百年来人类社会加速变迁和发展结果的理论概括。其次,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特定历程,并非亘古便有,也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自18世纪中叶以来近两百年直至目前仍在进行中的社会各方面、各领域的快速变迁和发展。再次,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不是绵延无穷期的,它包含着人类社会特定历史进程中的特定目的性,如相对于一些欧美发达国家来说,其社会现代化目标已基本或多数达到,进入了“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因而我们面临的现代化实践应是指欠发达国家或地区通过科技革新,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加速本国、本地区社会变迁,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

(1) 现代化的起源

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过程 and 目标的统一,它可以借助于一系列人为的社

会发展指标加以界定、描述和评估。近现代世界历史是由西欧率先揭开帷幕的，西欧特别是英国，是现代经济、社会、科技进步的起点。揭示特定的历史进程的原动力必须从生产力进步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寻找，而现代化的起源标志恰恰是在英国最初启动的工业革命，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说：“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展开始的。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的全面变革，而它的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以使用蒸汽机和低质量的机器大生产，以并不算太高的技术水平为特征，揭开了“工业革命”序幕。工业化的过程从纺织部门开始，逐步扩散到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如机器制造、铁路和船舶、农产品加工和农业生产等等。到1841年，英国农业产值和劳动力比重均降至22%~23%，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工业化国家。到1860年时，这个只占世界人口2%的国家，所生产的工业品竟占全球工业品总产量的45%，拥有世界商船总数的三分之一，占有世界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和世界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一，从而成为现代化的“先驱者”。

（2）三大革命：经济、政治、科技

人类经济环境根本性的重要转变始于1780年前后。它的重要意义不亚于从旧石器时代原始的狩猎人向新石器时代定居的务农人转变，工业化（尤其是蒸汽机）的贡献是用非生物能源取代生物能源，利用机器将热能转为动力，使人类能利用大量的新能源。可以肯定，近代西欧生产方式的革命是现代化发展的原动力，但切不可将这场起源于英国继发于欧美大陆的工业革命的涵义理解得过于狭隘，工业化乃至现代化的发轫正如一位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所确认的“实际上是可怕的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大变动的问题”。单一的生产力进步还不足以昭示一个新时代的形成，它必须和在此基础上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乃至社会结构共同发生巨大的变革才能推动社会产生全面的、深刻的、质的变化。18世纪后期开始迄今的现代化运动可以说是源于科技领域中的力学体系的形成和运用、经济领域中的纺织革命以及政治领域中的北美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而以后的每一轮现代化运动的潮涨潮落，也都是经济、政治、科技这“三大革命”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长波理论，200年的世界现代化运动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即四个“长波”），不难发现每一个波的崛起都蕴含着“三大革命”的激荡因素^[7]。

5. “经济长波”：发展理论新思路

前苏联早期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于1926年在美国发表了著名论文《经济生活中的长波》，首次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一个50年~60年的周期性大循环，即所谓经济长波。每一波中包括两个阶段，即上升和下降阶段。上升阶段又叫资本饥荒期，表现为对资本的需求增加，投资和资本输出增加，贷款利率提高，新兴产业建设的规模扩大，速度加快，就业人数增加，长期失业者消失。随着对资本需求的减少，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下降阶段，表现为投资减少，贷款利率降低，新兴产业建设放慢以至停止，失业人数增加。康德拉季耶夫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从1780年到本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三个长波，即1780年~1843年为第一个长波，1844年~1896年为第二个长波，1897年~1940年为第三个长波。这三个波恰好同现代化的起伏轨迹吻合而对应。从二次世界大战至今我们仍处在第四个长波中。进一步观察可以看出每一次经济发展的长波都同世界各国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产业结构变迁以及生产力进步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第一个长波是现代化在欧美的萌发阶段。以英国产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北美独立革命为代表，而在此之前的现代天文学和力学的创立是重要的前提和动力。17世纪末，牛顿力学

体系的最终完成，构成了现代机械、土木建筑、交通运输等工程技术的理论基础。于是，到17世纪80年代英国纺织机革命达到高潮。新机器问世，对动力机械提出了要求，在“珍妮纺织机”发明后不久，瓦特改造的蒸汽机出现了，用新的动力装备了新机器。继英国之后，法国也在19世纪初开始了“工业革命”，不仅采用了英国的棉纺机器，而且制造了织丝机和织麻机，并在制造业中普遍使用蒸汽机。在造纸、化工、玻璃等行业中也大量使用了机器。美国也在18世纪末把水力运用于棉、毛的纺织生产。在19世纪产生了一批制造蒸汽机的工厂，开始了加速工业化的过程。所以说，在新式纺织机和蒸汽机的推动下，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在1800年左右达到了第一波的高峰。与此同时发生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运动。在英国确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90年之后，1776年北美发生了独立战争，新兴的美国诞生了；不久法国像英国一样，以“三级会议”为导火线，爆发了大革命，充分显示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正是由于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克服了封建专制，不仅改变了政治制度，还使得社会结构和利益多元化，为18世纪经济“起飞”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保证。反过来，“工业革命”促进、巩固和完善了资产阶级各种政治、经济体制，并开拓了更多的海外市场，获得了更广阔的殖民地。

第二个长波发生于18世纪40年代至上个世纪末，是现代化运动在欧美继续拓展，从而在全世界迅速扩展的第二次高潮期。地处欧洲的德国、意大利在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之后较快地实现了工业化。比利时、瑞士等独立小国迅速成为工业化先驱国，它们稳定的经济增长开启了后来北欧国家现代化道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主要由白人移民组成的国家，在获得“自治”权后走上了“欧化”道路。俄国、日本、印度和中国也相继开始了各具特色的早期现代化。从科技创新领域来看，电力应用为新一阶段工业化和现代化注入了强大动力。19世纪是科学全面发展的世纪，其中重要突破就是能量守恒定律的确立和电磁学的重大突破。于是有了1866年西门子发电机的出现，1875年电动机开始应用于工业生产，可以说现代化第二波是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为推动力的。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科学发展也处于鼎盛时期，名家辈出，现代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理论的出现为现代化实践提供了理性指导，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诞生为现代化运动的一种崭新类型——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经济发展领域，铁路和银行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标志。它们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国家生产单位规模的扩大，技术和投资量的增长，并且开始将各地区的发展有力地联结到世界性经济体系之中。世界经济在19世纪后期出现了巨大增长，西欧北美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核心地区完成了初步现代化，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口一般降到40%以下，形成了世界上较发达的工业区。美国作为一个年轻的工农业大国在经济实力上第一次超过了英国。1860年，英国制造业产量在世界上占有份额为19.9%，而美国仅为7.2%；但到1900年时，英国的相对份额为18.5%，美国却猛增至23.6%。从此第一阶段的英国单一中心地位被多中心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格局取代。

第三个长波为19世纪末到本世纪40年代“二战”结束前，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受阻和积蓄内部力量而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因素迅速生长，在世界上别开生面的时期。这一时期有两件最为重要的史实，一是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是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诞生。前者是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全面失控引起的内部矛盾大爆发。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促成这一历史性巨变的动力，来源于现代工业生产力的持续增长和工业化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世纪之初，数百年间聚合的工业生产力，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工业强国之间引发了

旷古未有的两次“总体大战”。大战造成的巨大破坏，打断了工业资本主义的上升趋势，触发了第一次世界范围的发展性危机。在长达30余年里，军国主义横行，法西斯主义猖獗，对理性主义价值观的普遍怀疑，使人类首次陷入因“过量”发展所带来的困境之中。

这些新因素导致现代生产力的阻滞，延缓了现代化推进的势头。因而发展经济学家G. 雷诺兹在形容1914年~1945年世界经济最长的萧条期时称之为“暗淡时代”。在这个时期绽露出了社会主义时代的曙光，本世纪初俄国共产党人在列宁的率领下走上了探索一条新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1917年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继承并强化了俄国上个世纪中叶以来在工业过程中积累的以国家政权支配经济活动的经验，依靠新的政治制度推动技术革命和动员人力、物力资源。列宁认识到现代社会发展必须将制度创新和电工技术革命相结合，提出了颇具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化发展目标：“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1928年~1940年间，在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处于危机不断的年代里，前苏联工业创造了9%的年均增长率，成为世界大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高增长纪录，为后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探索社会主义新模式、新道路做出了示范。现代化的第三个长波也是世界范围科技革命不断深入并广泛运用的时期。这一时期电气和化学工业得到快速发展，推动了工业化国家产业、行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同时在铁路遍及全球之际，以美国为代表的汽车工业得到极大发展，人类交通形态得到重大改观，进入“汽车时代”。著名经济学家J. 熊彼特在1926年修订再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果断预言：“未来的历史学家最终将比较容易地认识到，电气、化学和汽车对大约从1897年开始发生的第三个长周期的上升和下降波发端的重要性。”

第四个长波是从“二战”以后至今，这是全球现代化全面加速期。现代战争经常成为不自觉地推动现代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工具。战争部分地克服了19世纪后期以来物质文明片面发展的负效应，加速了科技发展的更新换代，造成了经济恢复和增长的新的社会需求。战后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一系列民族国家的建立，又给制约战争和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带来新因素。历史进入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标志的新时代。经过战后初期的恢复调整，从50年代中期起，世界范围的工业化、现代化浪潮重新兴起，并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19世纪中后期的发展。首先，战时发展起来的先进军事科技技术向民用工业领域的转移，推动了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勃兴。以原子能、航天技术和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三大尖端科学成就的广泛应用，直接促进了整个社会生产的迅猛发展。在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通过新的结构改革，使旧有的发展模式不断得到修复完善，逐步向有计划有调节的经济运行方向过渡，从而开创了从1950年至1973年，20余年持续稳定增长的历史纪录。在这个被称作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年平均增长率达4.9%，远超过1870年至1913年的2.6%。相对持久的繁荣，把战前初步进入现代行列的工业化国家，包括西欧、北美、日本，推进到现代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形成生产集约化，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大军逐步向第三产业转移，大众高消费，以及推行普遍性社会福利政策等为特征的发达工业化社会。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社会结构也发生重大变迁，1950年~1970年间，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在21%~25%，1980年时这些国家已达到高度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率为71.66%。最先走上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前苏联，以及得到欧美风气之先的其他边缘半边缘国家，诸如北欧、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受这一浪潮推动，也进入较快的发展时期。

其次，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导致了殖民主义体系瓦解，使一大批民族国家获得独立地位。空前规模的革命风暴，开始把战后世界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卷入世界性变革大潮。社会主义体制也从前苏联一枝独秀而成为多国实践，并成为和西方工业